

张伯苓教学事业与社会活动的历程探究

叶新玉

天津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7i2.7139

[摘要] 张伯苓作为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把教育看做成是救国的一种方式,凭借着个人在社会各界的人脉和口碑,成功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做出的贡献不言而喻。张伯苓担任南开校长期间,与政界官员严修、军政要员蒋介石、张学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人士格林、饶博森等人展开了广泛的教育交往,为南开学校招揽人才,促进学校发展。纵观张伯苓的交往,其交往具有明显多样性、真挚性等特征。本文以交往为出发点,研究张伯苓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人士之间的往来活动,最后总结民国时期教育家的办学特点,期望可以更好的认识张伯苓并了解其教育思想。

[关键词] 张伯苓; 教育交往; 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 G724.82 **文献标识码:** A

Zhang Boling's teaching career and social activities

Xinyu Y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a famous educator and university president in modern and modern times, Zhang Boling regards education as a way to save the country. With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reputation in all walks of life, Zhang Boling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Nankai series of schools to China's modern education is self-evident. During Zhang Boling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of Nankai, he had extensive educational exchanges with political officials Yan Xiu, Chiang Kai-shek and Zhang Xueliang, and Green, Rao Bosen, and others, to attract talents for Nankai School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Throughout Zhang Boling's communication, his communication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ty and sincerity. This paper, taking the communic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studies the exchanges between Zhang Boling and the people i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o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oping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Zhang Boling and her educational thoughts.

[Key words] Zhang Boling;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Nankai University

引言

马克思交往理论指出,人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人有交往需求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而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内的交往主体又构成了社会的群体联结。^[1]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是教育家群体之间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通过交往,教育家之间形成了复杂庞大的教育交往网络,从而提升教育水平,实现教育救国意图。现阶段对于民国时期教育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家个人的思想、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的。张伯苓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参与众多的教育活动,交友广泛,与同时代的诸多教育家和政界的人士都有着密切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对南开学校的创办和其家族,而对其教育交往的研究并不集中,主要散落在年谱、传记和论著当中。因此,选择以

张伯苓的教育交往作为研究的论点具有研究的必要性。本文以军政要员严修、张学良、蒋介石等人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与张伯苓之间的交往作为研究主体,总结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特点及其为办学带来的现实意义。

1 教育界引路人——严修

早期张伯苓刚从海军行业退役转而踏足教育领域时,恰逢严修(字范孙,中国近代教育家和学者)变法失败辞官回到天津创办学校结识了张伯苓,同样的教育救国思想让两人一见如故,严修便邀请张伯苓执教严馆。严馆作为一所传播西方知识的家塾,让张伯苓站在了新式教育的平台上更好的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一起东渡日本考察日本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两人一起实地考察了一些日本学校,结识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棚桥源太郎和一些文部省大臣,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和

教科书编撰问题。^[2]正是在对日本教育考察的过程中，张伯苓感慨良多，在与严修的商量后，两人以执教的严馆和王馆为基础并效仿欧美教育制度建立了私立中学堂，最初的校址便是改造过后的严馆偏院，“校具及改建费由严先生捐助”。^[3]中学堂建成后，严修给予了极大地支持。物质上，每月银钱二百两以保障学校的日常经费。在精神上，严修“轻著述而重躬行”，注重从“实处去做”^[4]，严修以其务实的实干精神给予了南开精神最初的模样，“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便是其精神的体现。在察觉到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之时，张伯苓决定创办南开大学，于是便赶往美国进修学习，一年以后张伯苓回到天津组织起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在严修的陪伴下奔赴各地筹募经费，展开了与社会各界更广泛的交往。

2 结交政员,获得办学资源

南开学校的私立性质决定了其办学资源的不确定性。校长作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承担了与各界打交道以获取办学资源的重大责任。与政界人士的交往大部分虽然是出于为南开大学筹集资金的原因，但是张伯苓也用其真心与政界人士建立了真挚的情感。其中，张学良是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时必不可少的人物。

1916年，张伯苓去东北考察，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邀请演讲《中国之希望》，在这次演讲里，张伯苓讲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任何党派和官吏，而在每个中国人发愤图强，努力救国”。^[5]这样的言论让当时报国无门的张学良为之一振。随后，通过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结识张伯苓。^[6]1927年，已经升为高级军官的张学良感念张伯苓邀请其出任天津市的市长被张伯苓婉言拒绝。^[7]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张学良创办了东北大学，张伯苓积极帮助他物色优秀的教务人员，帮助规划学校设施，将南开优秀学子宁恩承推荐给张学良协助其管理校务。甚至还将当时被称作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事务主任孟琴襄派遣到东北大学工作一年。此后，他亲自前往东北大学指导工作，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人也受到张伯苓所托前去东大指导工作。因此在当时有报道称“南开精神由海河之滨而展至辽河之滨矣”。^[8]

两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为南开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帮助。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资金的支持，南开大学作为私立高校，学校的资金总是要依靠着校长张伯苓的“化缘”。正是基于与张学良之间良好的“师生情”，1928年12月18日，张伯苓电告南开大学同仁“汉卿先生允捐二十万元，分十年，每年交两万”。^[9]1926年年底，南开大学资金不足，四处欠款，但是应有的公款却被拖延发放，张伯苓多方请求无果后告知张学良请他告知顾维钧总理和汤尔和总长“务于日内将息款匀拨，以济眉急”。^[10]其次，就是对南开毕业生的关照。1926年6月28日，张伯苓致函张汉卿，请其为学生南开学校文科学生梁岩和潘景武某一职位。^[11]1926年7月21日，张学良来函，告以派梁岩在本部秘书处办事，潘景武为本部少校秘书。^[12]

20世纪30年代张伯苓与蒋介石初识，在第一次见面中，蒋介石

“垂询北方学务亟详”，对张伯苓三十年如一日的办学精神尤为钦佩，答应将设法补助南开。^[13]在两人见面后的第二年，国民政府便补助南开大学6.2万元。此后，蒋介石一直为南开大学提供资金的帮助，国民政府每年拨给南开大学的经费占南开全部经费的三分之一。蒋介石对南开大学的倾囊相助，在张伯苓的心里树立起一个政治伟人的形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经常对南开学校进行破坏，考虑到时局的严峻和南开大学的危险处境，张伯苓决定在重庆创办南开中学分校，便写信给蒋介石和教育部请求补助，蒋介石同意补助5万元帮助成立南渝中学。对这次帮助，张伯苓一直铭记在心。1936年爆发的西安事变，正是在张伯苓的斡旋之下，才得以顺利解决。1937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作为抗战中心的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日军对南开学校狂轰滥炸，泼汽油，纵火焚烧，南开学校被毁于一旦，对此蒋介石深表惋惜，并决心帮助。在蒋介石的帮助下，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由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共同管理。抗战胜利后，南开大学要在天津复校，蒋介石全力支持学校的重建，不仅在资金上优先拨放，而且市政府又将原日本学校的校产另外拨给南开。

多元化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校长面临复杂政局时必须解决的事情。一方面，教育是相对独立的，无法脱离政治谈教育。一些当权者把大学校长看作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会通过各种途径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巩固国民党政权，蒋介石等人士十分看重知识群体，因此对南开大学的支持与张伯苓之间的交往便是有其政治考虑的。且南开大学因严修的关系在创办之初就与政治关系密切。

另一方面，张伯苓深知教育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的环境，所以在与政治人士的互动中，张伯苓不仅筹措到了充足的经费还保障了南开学校的私立性质保证了学校发展的独立性。正是在他的斡旋之下，才能让南开大学在风雨漂泊中却依然成绩斐然。

3 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的往来

青年会是基督教的外围组织，是以德智体群为宗旨的社会改良机构。对中国的教育、体育和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青年会的目的本就是为了传播西方的基督教思想，因此为了扩大青年会的影响力，青年会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交往。张伯苓作为著名教育家，自然会受到青年会的关注。在张伯苓与饶伯森、郝君瑞等基督教徒的接触中，他的内心逐渐被基督教感化精神认同基督教，于是他开始广泛参加基督教活动，在1909年正式加入基督教并在同年的9月15日当选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

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推进教育事业，尤其是体育，与以前身为海军的张伯苓不谋而合。张伯苓曾说“我觉得青年会也同样在办教育”。^[14]南开大学早期建校的时候，格林、饶伯森、陶尔图等基督教干事就在南开学校兼职，讲授体育相关课程并组织体育、文艺活动，这就保障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并提高了师资力量，并扩大了南开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天津青年会干事董守义就任南开大学指导篮球运动，成就了“南开五虎”。在基督教青年会

的帮助下,南开大学的体育事业也一直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筹办南开大学的过程中,张伯苓经过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的介绍,在1917年8月去美国进修并在此后多次赴美进行募捐。也因此结识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如教育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凯尔鲍德里教授,还与孟禄进行了谈话,出席过各种基督教会议,结识各类人士和基金会,其中,他作为代表出席的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基督教会议就为他带来了与美国“罗氏基金”的结缘。张伯苓也为青年会提供了不少的支持,如输送人才、推荐干部等。何廉、张彭春、黄钰生等南开大学的教授都曾去基督教青年会做演讲;章辑五、伉乃如、梅贻琦、王治平、杨肖彭等人担任基督教青年会的委员或干事。

张伯苓将基督精神与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践行着其教育理念,实现他的爱国理想。

4 总结

无论是与政界人士还是与学校师生,张伯苓始终怀揣着一颗赤诚的心,与很多人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西安事变时,正是基于与张学良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张学良才能在张伯苓的劝诫下释放蒋介石。蒋介石也一直记着张伯苓对他的这份情谊,在南开大学毁于战火时做出了“有中国即有南开”的承诺。

张伯苓虽是大学校长,但他的交往对象并不仅仅限于教育学界,更是扩展到了政治、体育、艺术、科技等领域。早期留学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期间与杜威和孟禄缔交了深厚的情谊。作为一位对体育非常重视的教育家,他对于体育的提倡可以说是教育家中首屈一指的,也因此被誉为“体育校长”。基于同样对体育的热爱,他结识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格林和饶伯森,聘请了董守义作为南开大学的体育老师,与同样支持体育的张学良共同促成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参加了第七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南开大学的创办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其中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值得我们去研究,以南开大学作为私人创办学校的一个典型,可以部分看出在民国时期教育家私人办学的特点。首先,是在办学的质量上。由于要与公立学校做竞争,所以,更加重视学校的办学质量。南开大学从招生开始就严格选拔优秀毕业生,成立学校董事会对学校进行专门的管理,学生考试、请假和奖惩制度也更严格。其次,学校规模、教学设备、资金的筹措与教育家本身的交往有着很大的关系。私立大学相对于公立大学来说,缺乏来自于政府的稳定拨款,所以必须要扩宽资金的来

源渠道,这就有赖于校长在中间积极进行活动运作。就如张伯苓所说“盖私人经营之学校,其经济毫无来源,其事业毫无凭借,非得教育同志之负责合作,在校或出校校友之热烈爱护,与夫政府及社会各方之赞助与扶持,决不能奠定基础而日渐滋长也”。第三,教育家自身具备的精神——心系国家。大部分教育家办学是以爱国作为目标。学校处处体现出教育家的爱国情怀。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以此为校训,南开培养了很多为国家而奋斗的领袖和其他方面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 [1]侯杰,秦方.张伯苓家族[M].新星出版社,2018,05:29.
 - [2]姜秀华,刘艳敏.张学良与张伯苓的师生情缘[J].党史纵横,2007(3):61-62.
 - [3]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
 - [4]梁吉生,张兰普,龚克.张伯苓全集第10卷张伯苓年谱[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09:34.
 - [5]邓清,本刊资料.张伯苓与张学良的交往[J].文史月刊,2014(4):67.
 - [6]周利成.张伯苓与张学良的体育情缘[J].天津政协,2014(3):48-49.
 - [7]梁吉生.张学良与张伯苓[J].社会科学战线,1992(3):248-251.
 - [8]《张汉卿先生允捐本校》[J].《南开大学周刊》,1929(69):39.
 - [9]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上卷)》[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135.
 - [10]梁吉生,张兰普,龚克.张伯苓全集第4卷公文函电1[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09:42.
 - [11]梁吉生,张兰普,龚克.张伯苓全集第8卷公文函电5[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09:362.
 - [12]《张伯苓年谱长编》读后感[J].教育与职业,2013(4):108.
 - [13]张晓唯.张伯苓的周围——读《张伯苓年谱长编》[J].书屋,2014(4):39-44.
 - [14]张伯苓,著.张伯苓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35-13.
- 作者简介:**
叶新玉(1999--),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人,研究生,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